

总第五十七辑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2012年第3辑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经济
学家
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家茶座

总第五十七辑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 方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荆林波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特约编辑

朱庆民 李淑娟

特邀执行主编助理

维亚龙

卷首语

孙文凯 不断演进的经济学研究 / 001

国是我见

赵人伟 关注收入分配中的纵向失衡问题 / 004

汤铎铎 政府债务的累积与去杠杆化 / 011

陈 宪 中国经济：看好还是唱衰 / 015

欧阳峤 与美国经济学家对话大国经济 / 021

孙文凯 老龄化的中国怎么办 / 027

学界万象

李晓平 “坑爹”的教材 / 032

梁平汉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一块“飞地” / 042

荆林波 关于中国智库的思考 / 046

学问聊斋

陆 铭 讨论的“七宗罪” / 050

韦 森 从魏克赛尔到哈耶克与凯恩斯 / 054

赵世勇 冯迪刚 关于“理性与均衡”的师生对话 / 059

生活中的经济学

张清津 生活中容易被误解的经济学 / 065

皮建才 经济学里的“政策幻觉” / 070

陈争平 《十不足》、恩格尔定律拓展与需求层次论 / 073

经济随笔

王梦奎 随彭真进行的一次调查研究 / 078

聂辉华 唐僧为什么不授权给孙悟空？
——《西游记》经济学之二 / 083

高明华 杜雯翠 契约精神与高管薪酬 / 087

经济评论

- 陈 抗 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 / 092
俞宪忠 “父母官”的正当含义在哪里？ / 096
宋小宁 税收问题对话 / 100
宋胜洲 食品安全危机的经济学思考 / 102
李俊慧 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是“庞氏骗局” / 107
谢明干 反挥霍浪费应入法 / 112

经济学家

- 吴大新 亚当·斯密的“心路历程” / 117

财经阅读

- 徐康宁 《峰岭之外》自序 / 121
李增刚 《经济学其实可以很简单》自序 / 123
刘福寿 《笑里藏着的经济学》自序 / 125
俞炜华 学点真实世界经济学
——《社会问题经济学》自序 / 127
魏 新 “有意思”是为了“有意义”
——邵珠富《营销策划：有意义不如有意思》
读后感 / 130

他山之石

- 刘 毅 香港商业多面相 / 132
翟 华 “良心”与“理性”：
法国左派经济政策的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 137
李 成 改变从现在开始
——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初印象 / 143
吴崇伯 正在引起全球瞩目的印度尼西亚经济 / 148
祝曙光 日本的土地问题及其他 / 153
于洪良 王 晷 韩晓燕 山东财经大学成立庆典
隆重举行 / 1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57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978-7-209-06790-4
I. ①经… II. ①金… III. ①经济
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第219832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12
Email: 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8.00元

不断演进的经济学研究 / 孙文凯

在圣经新约里，唯一要记住的是耶稣是永恒不变的唯一真神。但是在经济学里，似乎没有永恒的东西，不同经济社会条件需要不同经济理论指导。即便是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些研究假设，有时候也可能是不成立的。如果你非要坚称自己永远是最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虽然没人会反对你，但也许会怀疑你的智商或动机。

学习过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知道，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或者特定的一群经济学家曾经被命名为不同的学派。我在大学学习的时候，曾经为了区分不同学派间的差异以及记住代表人物而大伤脑筋。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知识除了能够用来为难曾经苦读的我以及炫耀自己的知识外，作用不是很大。就我的观察，如今这种所谓学派的划分观念已经被大大淡化了，只是在讲授经济学说发展史的课程中会提到，以便学生了解某些经济学假设提出和结论获得时的社会背景。我个人认为，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科学，目前更多强调融合、演进各种知识以求达到解释和指导真实世界的目的，而不是教条地遵循某个适用于特定时期或解释特定条件下经济现象的学者的言论。

在国内，几年前甚至现在有过一段是否需要“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讨论，主要是对现有主流西方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能否完全适合指导中国经济的怀疑。西方国家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对西方经济学作用抨击的重要依据。批评者认为西方经济学虽然追求工具完美性和表面科学性，但假设过多，并且只关注局部的逻辑严密性，缺乏全局性，从而在解释现实问题上乏力。

当病毒的抵抗力增强时，治病的药物也需要不断增加新配方。面对当前的病毒，批评过去药物无效没有太大意义。经济学实际上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学科，在不断改善研究方法和结合不同学科思想进入以更好地解释现实。对于中国，我毫不怀疑其具有某些特殊性，学习现有经济学理论后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时需要格外关注和结合中国国情。比如大部分中国人永远不会理解和模仿比尔·盖茨及巴菲特捐献全部财产的做法，而且不亲身经历也不会理解美国人独立、热心和辛勤的特点。照搬书本、不经实践的盲目猜测会得出可笑的解释。中国特色决定了在中国进行经济学研究确实存在某些特殊要注意的问题，但是非要引入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学”框框来约束自己则毫无必要。



经济学家茶座

总第五十七辑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 方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荆林波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特约编辑

朱庆民 李淑娟

特邀执行主编助理

维亚龙

卷首语

孙文凯 不断演进的经济学研究 / 001

国是我见

赵人伟 关注收入分配中的纵向失衡问题 / 004

汤铎铎 政府债务的累积与去杠杆化 / 011

陈 宪 中国经济：看好还是唱衰 / 015

欧阳峤 与美国经济学家对话大国经济 / 021

孙文凯 老龄化的中国怎么办 / 027

学界万象

李晓平 “坑爹”的教材 / 032

梁平汉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一块“飞地” / 042

荆林波 关于中国智库的思考 / 046

学问聊斋

陆 铭 讨论的“七宗罪” / 050

韦 森 从魏克赛尔到哈耶克与凯恩斯 / 054

赵世勇 冯迪刚 关于“理性与均衡”的师生对话 / 059

生活中的经济学

张清津 生活中容易被误解的经济学 / 065

皮建才 经济学里的“政策幻觉” / 070

陈争平 《十不足》、恩格尔定律拓展与需求层次论 / 073

经济随笔

王梦奎 随彭真进行的一次调查研究 / 078

聂辉华 唐僧为什么不授权给孙悟空？

——《西游记》经济学之二 / 083

高明华 杜雯翠 契约精神与高管薪酬 / 087

经济评论

- 陈 抗 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 / 092
俞宪忠 “父母官”的正当含义在哪里？ / 096
宋小宁 税收问题对话 / 100
宋胜洲 食品安全危机的经济学思考 / 102
李俊慧 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是“庞氏骗局” / 107
谢明干 反挥霍浪费应入法 / 112

经济学家

- 吴大新 亚当·斯密的“心路历程” / 117

财经阅读

- 徐康宁 《峰岭之外》自序 / 121
李增刚 《经济学其实可以很简单》自序 / 123
刘福寿 《笑里藏着的经济学》自序 / 125
俞炜华 学点真实世界经济学
——《社会问题经济学》自序 / 127
魏 新 “有意思”是为了“有意义”
——邵珠富《营销策划：有意义不如有意思》
读后感 / 130

他山之石

- 刘 毅 香港商业多面相 / 132
翟 华 “良心”与“理性”：
法国左派经济政策的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 137
李 成 改变从现在开始
——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初印象 / 143
吴崇伯 正在引起全球瞩目的印度尼西亚经济 / 148
祝曙光 日本的土地问题及其他 / 153
于洪良 王 晔 韩晓燕 山东财经大学成立庆典
隆重举行 / 1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57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9
ISBN978-7-209-06790-4
I.①经… II.①金… III.①经济
学-文集 IV.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第219832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012
Email: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24-180
定价:18.00元



关注收入分配中的纵向失衡问题 / 赵人伟

一、纵向失衡——收入分配研究中一个值得拓展的领域

在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中,迄今人们都集中在居民收入分配的横向失衡或横向不平等^[1]上面,这无疑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我国已经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估计还有差异,不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甚至已经接近0.5的水平。因此,中国收入分配已经列入最不平等国家的行列。正因为如此,收入分配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长期以来,人们对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部门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间的收入差距)进行了许多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的注意力都放在横向的不平等上面。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拓展。例如,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我国经济学界对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特别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显然是对上述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研究的一种拓展。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从小分配关系(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拓展到大分配关系(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再如,由于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有着互动的关系,又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已经从几乎没有什么个人财产发展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和显著分化的状况,我国经济学界对财产的分配状况也进行了若干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我国个人财产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对财产分配及其同收入分配的关系的研究,显然也是对上述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研究的一种拓展。不过,就这两方面的拓展来说,人们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横向的不平等问题。具体来说,它们是考察在

[1] 本文把横向失衡(horizontal imbalance)和横向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视为同义语,把纵向失衡(vertical imbalance)和纵向不平等(vertical inequality)视为同义语。本文所说的纵向失衡,系指代际失衡。

一个时点上居民之间的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关系以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即使有时有不同时段和不同时期的考察，但考察的重点仍然是横向的不平等问题，很少涉及不同代人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代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或收入分配的代际失衡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在这里，我们把不同代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定义为收入分配的纵向失衡，或简称代际失衡。当然，我们不能用平均主义的观点来看是否失衡。这里的所谓失衡，是指收入的差距超过了合理的区间。在这篇短文里，我仅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案例和思考，并对其成因进行一些探讨，其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供学术界同行们进一步切磋。

二、收入分配纵向失衡的若干实例

（一）长期的工资冻结造成的代际失衡

我国从1956年实行工资改革以后到1977年实行工资调整以前的大约二十年时间，实行的是工资基本冻结的政策。其间，只有1963年对部分人员实行了工资小幅调整的政策。工资的长期冻结造成了对青年一代人不利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表面来看，工资的长期冻结似乎对所有的人的影响都是相同的，换言之，在工资冻结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但是，实际情况则不是如此。因为，在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劳动贡献曲线的变化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劳动者一生中劳动贡献的曲线呈抛物线状态，即在工作起点时贡献较小，壮年期达到高峰，近老年期又有所下降。因此，劳动者一生中的劳动报酬也应该呈抛物线状态，即初参加工作时比较低，壮年期达到高峰，而后有所下降。然而，工资冻结则意味着把劳动报酬的曲线变成了一条不变的直线。这种因工资的长期冻结而造成的对青年一代人不利的收入分配格局，当年无论是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学校），还是在国有企业，情况都是类似的。最近，我对我所在的当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有关情况做了一点回忆和调查：我把1957年前后至1977年前后一直在经济研究所就职的人员中选了二组：一组是1957年（或前后）的正研究员和行政11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简称高研组）；另一组是1957年（或前后）的初级研究人员，其中多数的职称是实习研究员（简称低研组）。经我本人回忆和查阅有关资料，在1957年，上述高研组的平均年龄约45岁，低研组的平均年龄约25岁；高研组的平均月工资为227元，低研组的平均月工资为64元。1963年，国家对部分低研组人员的工资作了微调。不过，经过局部微调，低研组的平均月工资仅仅长了8元，到1977年只有72元。高研组的工资虽



然未作调整，但直到1977年，仍然大大高出低研组的工资。到1977年，上述两组人员的年龄都长了20岁。换言之，经过20年的变迁，低研组人员的年龄已经达到20年以前高研组的程度，但是，他们的工资仍然不及20年以前高研组人员工资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况，即使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未曾出现过。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这种代际失衡的情况及其后果，上世纪80年代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学术界反响比较明显的是北京中关村地区出现了若干中年科学工作者英年早逝的相关报道；文艺界反响比较突出的是《人到中年》电影中所描写的陆文婷大夫（由潘虹主演）的尴尬处境——不仅回报大大低于付出，而且因其社会地位同所得的回报一样低下而遭遇鄙视。

（二）在职人员同离退休人员之间的失衡

这里我们以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同高等院校一致）为例。众所周知，1956年工资改革的时候，高等院校的职务（或职称）和工资等级是有差别的。从职务或职称来说，高等院校分为正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个等级，但工资则分为12个等级（1957年扩大为13个等级）。正教授的工资为1、2、3、4级，副教授的工资为4、5、6、7级，讲师的工资为7、8、9、10级，助教的工资为10、11、12、13级。但是，1985年的工资改革推行的是职务工资制，取消了一个职务或职称下面的不同工资级别。这种体制在实行了大约20年以后，又逐步恢复了一个职务或职称之下分为几个工资等级的体制。例如，正教授的工资分为1、2、3、4共四个等级。于是，1985年以来形成的职务或职称又要重新进入相应的工资等级。就以正教授来说，他们要分别进入1、2、3、4级，而起点则只能是4级。但是，这种恢复只适用于在职人员。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从1985年以来的大约二十年间退休的人员应该怎么办呢？由于他们已经退休，不能进入重新设置的工资等级。如果他们的退休金只能同相当职称的最低档（例如，正教授的最低档是4级）相适应，那又如何反映他们在这20年间所作出的劳动贡献的差别呢？这种体制和政策的变迁显然造成了对离退休人员不利的收入分配格局。换言之，在收入分配问题上造成了在职人员同离退休人员之间的代际失衡。

（三）退休人员内部的失衡

在2006年的工资改革过程中，我应有关方面之约撰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发表以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谈的是退休人员内部收入分配的失衡问题。例如，同样是局级干部，或同样是处级干部、科级干部，20年以前退休的、10年以前退休的和近期退休的，收入差距很大。原因有两个。第一，退休金是按临退休前的工资和一定的替代率计算

的。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即使是同等级别的干部,在不同时间段,临退休前的工资水平是不一样的。换言之,退休越晚,临退休前的工资就越高。于是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对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一代人不能享有相应的成果。第二,由于在职人员额外补贴不断增高,而计算退休金时并不将这些补贴作为基数。于是,我国的退休金的名义替代率即使达到90%以上乃至100%,实际替代率往往在50%以下,而西方国家即使只有60%左右的替代率,其实际替代率也往往高于我国。

(四) 离休人员同退休人员之间的失衡

在外国,年老时只有退休的制度安排,而我国则有退休和离休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即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工作的人享受离休的待遇,此后参加工作的人则只能享受退休的待遇。这种制度安排虽然可以对建国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员给以较多的照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在离休人员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和经济利益带来纵向的不平衡。最为突出的是在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参加工作的人员同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员之间的不平衡。2002年我曾经在某国有企业的调查中看到这样的实例:有的抗美援朝干部曾作流血贡献,但有病时往往因报销比例太低而无法住进医院;而仅仅在大约一年以前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则可以住在医院享受较高的公费医疗待遇。

(五) 住房价格的急剧变动造成的代际失衡

住房作为财产是存量,收入则是流量。存量和流量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存量分配的失衡必然会加剧流量分配的失衡。2005年以来我国住房价格的飙升造成了收入和财产分配上严重的代际失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由于住房价格的急剧变动,我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分为35岁以上和35岁以下的两大人群。35岁以上的人群,要么分到了福利房,要么30岁左右结婚时买了房子。然而,35岁以下的人群由于年龄的原因没有赶上福利分房,到了结婚的时候想买房,但房价上涨了好几倍,就只能望房兴叹。可见,近年来房价的飞涨造成了对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不利的分配格局。

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收入分配中纵向失衡的一些案例。

说到纵向失衡问题,不仅中国存在,而且国外也存在。

国外有关纵向失衡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社会福利领域。例如,在养老保障中,如果年青一代的劳动者交纳高额税负以资助领取公共年金的退休老人,但他们也许永远得不到与他们的缴费相同的补偿,这就会产生付出和补偿之



间的代际失衡问题。又如，医疗服务往往是针对人的生命周期的某个特殊阶段提供的，大部分的医疗服务都用在人的生命周期的初期和末期，特别是末期，从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负担者）和接受者之间会产生分离，产生代际失衡。教育服务主要是提供给年青一代人的，也存在着代际问题。因此，代际问题就成为收入分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国外有的学者提出要关注代际和谐（Inter-generational harmony）。我想，所谓提倡代际和谐，并不是要反对代际互助。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各个领域的代际互助，包括收入分配领域的代际互助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要掌握一个度，使代际互助不要变成代际失衡。当然，掌握这个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据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期间曾经通过发行国债的办法来筹资建设州际高速公路。不过，在执政生涯的末期，他一方面为自己支持了州际公路系统的建设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留下了国债而感到惋惜。可见，在“骄傲”和“惋惜”之间，在“为子孙后代造福”和“吃子孙饭”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在艾森豪威尔的头脑中也是困惑难解的。

如果说，国外的代际失衡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领域，那么，我国的代际失衡则表现得更为广泛。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发展背景和特殊的政策背景所形成的。下面，我们拟就我国特殊背景下收入分配中的纵向失衡或代际失衡的成因问题作一探讨。

三、收入分配纵向失衡的成因探讨

（一）发展过程中的大起大落问题

上述纵向失衡有许多是因发展过程中的大起大落造成的。长达 20 年的工资基本冻结显然同 1958 年大跃进的失败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和“文革”造成的经济困难有关联。众所周知，在上述 20 年期间，我国曾经发生过 3 年的经济负增长。那么，在这两次经济困难之间为什么有 1963 年的工资局部调整（提高）呢？这是因为，在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之后，政府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为调整工资提供了些许物质基础。遗憾的是，此后不久，又开展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经济再度陷入了困境。可见，经济困难是造成上述工资基本冻结带来的收入分配关系扭曲的根本原因。

住房价格飙升显然是经济发展失衡在价格波动上的反映。经济发展不可能是一条直线，但如何防止急剧的波动，即防止所谓的大起大落，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上述住房价格飙升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上的代际失衡，还仅仅是因果关系链

条中的初级层次，即分配失衡同房价的关系。这个链条中的更深的层次是房价为什么会飙升？人们都会说，原因很多；在诸多原因中，不可否认的是土地出让费用太高。然而，土地出让费用太高是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分不开的。于是，有的国际专家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过度地依赖土地出让作为收入来源，这等于剥夺了未来的市民可以从土地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并认为这是一颗“定时炸弹”，应该尽快加以排除。如果这一评论是可取的话，那么，既然今日的土地财政是剥夺了下一代人的收入，就又产生了另一个代际失衡的问题。仅仅在住房问题上，我们就面临了双重的代际失衡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开双重代际失衡这个结？看来，既要有战略眼光，又要有战术措施。

（二）政策演变中的连续性和协调性问题

人们常常说各项改革措施和各项政策应该配套。在英语中，则常常用一致的、协调的（consistent）来表达这种思想。不过，人们往往是从横向的比较来看这种协调性的。实际上，政策和措施的这种协调性不仅表现为横向，而且还表现为纵向。具体来说，就是政策的发展变化要有一定的连续性。上述1985年的工资改革显然同先前的工资改革（1956年的工资改革形成了改革开放以前工资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后来的工资改革（2006年的工资改革）缺乏纵向的协调性和连续性。工资形成机制是沿用计划体制还是要转变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这确实是属于体制改革问题（特别要注意劳动力是否能流动、劳动力市场是否形成）。但是，一些属于工资等级的划分之类的问题，诸如教授的工资要不要分为1、2、3、4等级，则不存在姓计划、姓市场的问题，更不存在姓资姓社等问题。在体制改革中，没有必要在这类纯技术问题上进行朝三暮四的变动。

在住房改革问题上，也存在着政策的连续性问题。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指引下，中国掀起了进一步推动市场取向的改革热潮。但是，也许是由于对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不同作用缺乏深入了解，改革中出现了一些简单化的思维和政策。例如，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遇到问题找市场，不要找市长”。在政策实践中，则将一些本来不应该都推向市场的准公共产品（诸如教育、医疗、低收入者的住房等）过多地推向市场。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市场化不足（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和市场化过度（不该市场化的推向市场）并存的局面。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的住房改革实行了过度市场化的政策。到了新世纪，当我们将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后，又不得不回过头来进一步发展保障房。

上述离休人员同退休人员之间的失衡虽然不涉及政策的连续性问题，但却涉及政



策的一刀切问题。按照参加工作的时间来区分不同群体是一种简便而明快的办法，但是，也会产生一刀切的弊病。看来，这种政策在贯彻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使这种代际失衡加以稀释。

（三）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多方博弈问题

决策过程中必须有多方的博弈才能使各方的利益在博弈中得到比较均衡，以避免利益过分地向某一或某些集团倾斜，从而损害其他集团的利益。如上所述，工资长期基本冻结的政策固然同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所造成的经济困难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经济困难面前作何种政策选择则同决策过程中有无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有关。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当年的冻结政策选择显然同弱势群体无权参与博弈有关，由既得利益集团单方面所选择的政策只能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从而使得因经济困难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主要由年青一代人来承担。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今后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决策中，必须听取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意见，并且要促使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多方博弈，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避免利益的失衡，包括纵向的或代际的失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政府债务的累积与去杠杆化 / 汤铎铎

从 2007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到最近希腊国债违约，世界经济在持续的危机和动荡中步入第六个年头。随着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不断发展和演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人们对经济危机的理解和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本次危机是一场不断触发的连锁反应，令相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手忙脚乱、应接不暇。这就导致这些机构的关注点一直都不能离开危机，也导致大量的研究力量集中于此。比如，最近的一个研究焦点集中在债务问题上。从居民债务到企业债务，再到金融部门债务，直至政府债务，其导致的破产、违约和重组层出不穷。危机发生是由于经济主体负债过度而导致债务不能履行，危机的最终收场则要利用各种办法分担和消解债务。更时髦的说法是，危机源于经济主体的高杠杆，危机爆发则启动了去杠杆化进程。所以，危机发展到这个阶段，债务问题成为焦点有其内在逻辑，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

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增长

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一个逐渐清晰的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债务经历了惊人的增长。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研究指出，在过去的 30 年中，发达国家的非金融总债务（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占 GDP 比重，从 1980 年的 167% 上升到目前的 314%，平均每年增长 5 个百分点。危机爆发时居民和企业债务处在中心位置。随着救助行动的展开，各国政府公共债务和央行资产负债表开始急剧膨胀。比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 2007 年分别为 62%、167%、65%、70% 和 47%，到 2011 年则分别增加到 100%、204%、85%、99% 和 94%。全球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急剧扩张。比如，经过几轮量化宽松政策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从 9000 亿美元扩张到 2.85 万亿美元，是原来的 3 倍还要多。

从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危机下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然而，



从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则是居民和企业的负债通过各种方式逐渐集中和累积到政府部门，政府的或有负债迅速变为确定负债。最近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表明，政府作为所有债务的最后担保人，其能力也是有限的。不过，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其新著《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中所指出的，“债务国无须动用稀缺的国家资源来偿还债务已成现代惯例。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中，没有人相信莫斯科会为了安抚西方债权人而动用冬宫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主权债务的偿付依赖于各国的还款意愿而非还款能力的事实表明，主权国家破产和企业破产是两类明显不同的事物。”实际上，在赖账的能力和手段方面，居民和企业都无法与主权国家相比拟。

近期的很多研究都表明，高债务会损害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清算银行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是，无论对居民、企业还是政府来说，债务占GDP比重的上限都大致在85%到90%的范围。有研究者则进一步指出，如果合理的总债务负担率为180%，那么各大经济体的去杠杆化过程任重而道远。以2009年的数据估计，美国需要消减的总债务约为8万亿欧元，欧元区需要消减的总债务约为6万亿欧元。近期希腊国债的重组拉开了消减主权债务的序幕，这一进程还远未

结束，好戏还在后头。可见，现代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逻辑是，先把债务和风险都揽到自己身上，然后一边拖延一边想办法。

政府债务的清算

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发达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任务，就是消减政府债务。一般来说，政府消减债务大致有四个途径：（1）紧缩财政；（2）出售资产；（3）金融压抑和通货膨胀的隐蔽手段；（4）公开违约和债务重组。紧缩财政是最直接、最自然的途径，既然欠了很多钱，就应该增收节支，勒紧裤腰带还债。不过，对政府来说，这一手段只在债务水平较低、宏观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才能采用，目前各国应该都不会认真考虑。另外，前已述及，债务国政府一般也不会考虑出售国家稀缺资源来偿还债务。也就是说，居民和企业等普通债务人最经常使用的手段，政府一般都不会考虑。政府实际会选取的途径是后面两条，有条件的话最好能采取金融压抑和通货膨胀的办法，隐蔽地消减债务，否则就只能公然违约了。前者显然要比后者巧妙，不过实质相似，都是赖账。

金融压抑主要包括利率和资本管制，以及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银行和企业，为自身提供融资便利。莱因哈特在另外

一项合作研究中指出,配合相对稳定的温和通胀,金融压抑是政府消减债务的最有效手段。他们发现,在1945年到1980年间,很多发达经济体有一半的时间保持实际利率为负,借此消减政府债务。相关估计显示,美国和英国在这一时期消减的债务平均每年占GDP的3%~4%,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甚至达到5%。这意味着依靠负利率等金融压抑手段,10年中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能降低30%~50%。当然,并不是所有经济体都有条件、有能力采取这些措施。

希腊近期的债务重组提供了一个公开违约的例子。揆诸历史,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从前述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新著整理的数据集中可见,1800年至今主权外债违约有二百五十多次,内债违约也有七十多次。这一研究还指出,由于数据很难获得,政府内债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关注,而它们是解释外债违约和恶性通胀的关键证据。也就是说,由于存在很大规模的国内债务,政府不得不选择外债违约和恶性通胀。总之,以当下的债务规模和经济环境而言,发达经济体已经不会也不可能通过紧缩财政和出售资产成功消减政府债务,或隐蔽或公开,赖账已经成为必然。

政府部门去杠杆化的简单情景模拟

根据定义,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即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利率。当财政赤字、增长率、通胀率和利率保持稳定关系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会收敛到某个特定水平。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增长率和利率之差。首先,只有实际(名义)增长率大于实际(名义)利率,国债占比才会收敛,否则就会出现爆炸性增长。其次,实际(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名义)利率之差越大,国债占比向稳定水平的收敛速度就越快。最后,实际(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名义)利率差的大小还决定了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水平。

简单模拟的结果显示,在1.5%的财政赤字水平下,通过压低利率、提高增长和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胀,可以逐步消减政府债务水平。在增长率和利率差为3%的温和情况下,200%的初始政府债务占比在10年后缩减为165%,20年后缩减为136%;100%的初始政府债务占比在10年后缩减为89%,20年后缩减为79%。在增长率和利率差为6%的激进情况下,200%的初始政府债务占比在10年后缩减为128%,20年后缩减为83%;100%的初始政府债务占比在10年后缩减为70%,20年后缩减为50%。



因此，政府消减债务的最佳宏观经济环境，是稳定的增长、温和的通胀和低利率。这种环境配合政府审慎的财政政策，能较快降低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目前来看，美国、日本和德国等经济体有能力利用这一途径消减政府债务。希腊之后，其他“欧猪”国家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面临较大的公开违约和重组的风险。

结论和启示

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看，债务膨胀的另一边必然伴随着资产膨胀，也就是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破灭导致债务不能履行，于是爆发危机。资产泡沫神话是一切危机的先导。正如莱因哈特和罗格夫新著的书名——“这次不一样？”——所强调的，在每次资产泡沫的盛宴中，都会有一个“这次不一样”的动人神话，让人们忘记过去的教训。因此，近来的一个共识是，政府应该对资产负债变动和资金流动加强监管，以便及时发现和

化解隐藏的金融风险。

危机爆发时居民和企业债务处在中心位置，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救助之后，政府债务出现明显膨胀。整个经济像一个连通器，债务在危机发生时向政府集中。因此，居民和企业会率先完成去杠杆化过程，政府的去杠杆化进程会滞后于居民和企业，并且在方式方法上与二者截然不同。在比较理想的宏观环境下，政府可以用压低利率和提高通胀等隐蔽手段消减债务。在极端情况下国家也会破产，宣布公开违约和债务重组。

从我国的宏观环境看，增长率和利率之差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意味着我国政府自身债务风险不大，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会处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启了消减政府债务的进程。无论是为隐性违约营造宏观环境，还是直接公开违约，都会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这需要我们认清形势，积极应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